



HUMAN
RIGHTS
WATCH

“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

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



“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

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

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藏族自治行政区

摘要

主要建议

调查方法

I. 人权概况

2008 抗议事件及其后续

II. 迁居与住房改造政策

西部大开发（2000）

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安居工程（2005 迄今）

跨越式发展战略（2010）

谁得到好处？

III. 可适用的法律标准

国际标准

财产权与土地权安全

强迫搬迁与适足住房权

其他有关出于发展目的的强迫搬迁标准

一般性人权保障机制

国内标准

财产权和土地权制度

抵抗搬迁的程序保障

草场法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许诺

对政府宣称住房改造和迁居均出于自愿的质疑

IV. 咨询和救济不足

救济的不足

V. 补偿和补助不足

补偿费的计算

VI. 住房品质和适宜性

VII. 财务负担的加重

资产转移做为“自筹资金”

VIII. 其他文化和经济冲击

农作物和牲畜损失

生活成本提高

就业机会有限

文字框：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要求停止住房改造或迁居
融入城市商业经济的困难

IX. 建议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对国际捐助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

对在藏区投资的中国和国际基建公司

X. 附录

名词对照表

中国藏族自治区域名称对照表

致谢

摘要

我现在搬进新房子，生活很舒适。我很高兴。我有这样的好福气不是因为拜佛，而是共产党给我的。

—德吉，《中国西藏》，2009 年 3 月

农村的百姓对于要放弃自己的房子，被安置到其他地方，感到十分苦恼。他们除了种田别无所长，以后再也没有多少牲畜和土地了。下一代如何还能像藏人一样生存下去呢？

—人权观察访谈记录，西藏自治区江达县，2012 年 7 月

自 2006 年起，中国政府就在名为“安居工程”的政策之下，对西藏自治区农村的大多数居民执行大规模“住房改造”方案——即改建原有住房或兴建新住房。同时，中国政府在西藏高原东部，大部分属于青海省的区域，加速藏人游牧民的迁移和定居化，并且在高原其他部分为类似政策进行铺垫。这两项政策都是中国政府在藏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一部分，其目的照政府说法是要加速改善藏区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刺激当地经济发展。

依据这些政策改造西藏农村人口的范围和速度，是后毛泽东时代前所未见的。根据官方数据，在 2006 到 2012 年之间，西藏自治区已有 2 百万居民在这个政策下被迁入新建住房或改建原有住房，占自治区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在 2006 到 2010 年住房被改造的人口中，有 20%（约 28 万人）被迫搬迁，有些迁到附近但有些很远。中国政府计划在 2015 年之前还要将 18 万人的住房改造。

在西藏高原东部的青海省，中国政府自 2000 年代初期以来已迁移安置 30 万牧民，并计划在 2013 年底之前再将 11 万 3 千人由游牧改为定居。届时该省游牧民将有九成改为定居。定居化——即离开草原，迁入固定住房——是安居工程关于游牧民方面的政策核心，许多游牧民被迁移或住房被改造后被迫离牧定居，对西藏的文化产生很大影响，造成许多藏人不满。

在藏区实施的这项政策，现正成为中国其他地方重新安置少数民族群的样板。2011 年 6 月，中央政府指示所有省级行政区，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 2014 年底前完成所有既定的重新安置计划，受到影响的游牧民将高达数十万人。

中国政府宣称，所有的重新安置和住房改造都是自愿性的，做到尊重“西藏农牧民的意愿”。它强烈否认其中有任何强迫搬迁的问题，并为表现其文化敏感度，强调所有新房从设计到外观都符合“民族风格”。中国政府还宣称，所有被迁入新居的人都非常满意，并且感谢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种描写藏人迁居后感恩戴德的文章，自 2006 年以后大量充斥藏区官方媒体。

但是，根据人权观察在 2005 到 2012 年间所做的访谈发现，无论来自农村或牧区的藏人都表示，那些被迁移或住房被改造的藏人并非出于自愿，相反地，政府从未咨询他们的意见或提供其他选项。他们说，许多人因为举家搬迁、减少牲口或拆除改建房屋而陷入财务困难。他们说，新建的安置房比他们原本的住房还差，而且地方官员为诱导他们迁居而许下的承诺大多未能兑现。

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无论来自农村或牧区的受访者都谈到一些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有关的共通问题。这些共通问题包括：

- 许多迁移或住房改造方案的非自愿性质；
- 事前没有真正地咨询受影响群体的意见；
- 对于违法的拆迁命令，缺乏有意义的申诉或救济管道；
- 不适当且不透明的补偿机制；
- 社区被迁移或住房被改造后，新居的质量不佳；
- 因搬迁及 / 或改造住房而增加的财务和债务负担；
- 有形无形的资产损失和社区解体。

接受本报告访谈的藏族人士所指出的某些问题，例如生活成本提高、负债、财物损失和社区结构的根本改变，令人对中国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政策的可持续性感到忧虑，特别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初期补贴和投资停止之后。在游牧民定居或重新安置方面，已逐渐看到不可回复的区位错置和边缘化问题，连官方媒体都开始偶尔关注这个事实。隐含在上述所有问题之中的，是藏人的恐惧感——担心这些政策将使他们丧失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

本报告认为中国对藏族人民的迁移是“强迫性的（forcible）”，并非因为我们能够证明官员使用暴力逼迫藏人离开原居地，而是因为政府没有留给藏人选择余地。根据国际法，“强迫搬迁（forced eviction）”并不限于用强制力迫使居民离开家园，它同时也适用于在搬迁前未经有意义的咨询和补偿，或未曾提供迁移之外的其他选择。中国政府的迁移或住房改造政策及其实践，通过将相关政策呈现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实际上迫使民众不得不服从政府的命令，或——对游牧民而言——迁入固定安置点。

受访者告诉人权观察，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改造他们的村庄，部分原因是为了加强对藏人的控制，即使政府早已借口打击民族分裂意识而严格限制藏人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表达。这种恐惧近来达到高峰，因为政府于 2011 年宣布，将在西藏自治区派出逾 2 万名党政干部进驻农村，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保持藏区稳定”，“宣讲党的惠民政策”和“推进安居工程”。

接受人权观察访谈的藏人还说，实际上他们常常是被强迫放弃原本贫穷但稳定的生计模式，接受货币经济的不确定性，而且他们在其中通常处于弱势。

虽然中国政府对住房改造和迁移政策所受到的任何批评与关切均予断然否定，并将其扣上“政治动机”的帽子，但在中国官方的一些报告或以中文发表的学术研究中，却承认存在某些重大缺失。举例而言，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调查组 2009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详述了西藏自治区安居工程在实施上的缺点，与人权观察根据访谈藏人所做的报导内容非常相近。该报告列出的各项问题包括新住房“缺乏合理设计”、住房设计忽略农民实际需求、浪费建材装修房屋、以及为翻修或改建住房而放出的银行贷款遭住户拖欠的风险大增等等。国务院的这份报告指出，有些社群被迫放弃原本赖以维生的牲口和家畜，它也注意到有些安置点的选址不当或具有潜在危险性。

人权观察还在官方政策文件和中文学术研究中发现强有力的证据，指出在翻修或改建住房时，大部分成本是由居民自行承担。官方数据显示，自筹资金和强制贷款占到改建或重新安置成本的六成到七成——对许多藏人尤其是贫困家庭而言，是相当沉重的财务负担。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大部分政府公告和官方媒体的说法——一般藏人对安居工程的主要认知来源——显然刻意隐瞒家户负担的重要性，反而营造一种政府单方面负责“解决住房困难”的印象。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立中国政府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即根据官方标准建造或重建农村——是藏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核心理论基础。虽然这项运动涵盖了许多叠床架屋的政策，而且各地在执行上互有差异，但其中可以归纳出两条政策主线，其目的都是迫使藏人搬出传统住宅，住进新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 第一条政策主线由各种不同的“安居工程”方案构成。基于这项政策，藏族农民的住房被政府认为不适宜的，必须严格遵照政府标准拆除重建，有时是原地重建，有时则必须迁移到现有或新建公路沿线的安置点。相关办法规定，兴建或改建新住房的成本，由国家补贴、银行贷款、住户现有存款和其他自

有资产分担。这项政策自 2006 年开始，主要在西藏自治区实施，但已逐渐推广到西藏高原的东部。“安居工程”这个名词也逐渐被政府用来指称任何改善西藏民众生活水平的政策，并且纳入诸如交通、供电和卫生保健等其他议题。

- 第二条政策主线由各种针对游牧民定居或重新安置的计划构成。依据所谓的“生态移民”政策方案，游牧民群体必须离开草原，迁入通常位于中小城镇周边的集中安置点，并且把牲口减少或变卖。这些方案主要在西藏东部（青海省）实施。人权观察没有在西藏自治区或四川各藏区发现这种强迫游牧民永久定居的政策，不过政府也通过为游牧民兴建永久住房的方式，鼓励游牧民定居。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不仅在西藏自治区和西藏东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在同一省区之内，相关政策的实施也常常因地制宜。其强制程度和侵犯人权的规模，在各地有很大不同。

人权观察由访谈得知，西藏人口中部分群体，包括许多藏族干部、企业家及其家属、以及普通农民，确实受惠于迁移或住房改造。在西藏高原的部分地区，也可以看到经济成长和繁荣的迹象，其因素包括国家补贴、大量基础建设投资、都会区和市场的扩张、对当地药材制品的需求上升，也包括营建相关活动。许多藏人渴望改善生活条件，欢迎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

有些藏人真心欢迎并且受益于某些住房政策，但许多人仍然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长久维持生计。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只能被动接受政策摆布，没有能力反对或影响政策。

官方解释

中国政府对于大规模住房改造或迁移的政策，曾经提出几种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官方长期的“援藏”政策，政府宣称其目的在于加速改善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国政府强调，迁移和住房改造政策为藏人提供了更好的住房、供电、供水、交通、学校和医疗保健，防治天然灾害，并推动快速转向货币经济。根据中央政府的说法，这些步骤可以为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创造机会，参与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还提出其他一些目的，包括充分开发西藏高原的自然资源，执行始于 2000 年的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借以缩短西部贫困省分和中国其他区域之间的经济落差，包括通过城镇化的提升。对于牧民方面，中国政府一贯强调，为了保护青

藏高原的脆弱生态系统，必须使游牧民群体离开草原，因为，政府主张，草原被破坏主要是因为过度放牧所造成。

紧张情势不断升高的前因后果

在本报告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我们在 2007 年针对牧民社群提出的担忧现已成真：新建的安置点不具可持续性、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恶化、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比以前更高。多项中文学术研究也得到同样结论，本报告引用或摘录了其中一些研究成果。有些中国学者更对重新安置政策的“急就章”性质表示忧虑，他们指出过去许多社群被迁移后反而遭受不少损害和无法预见的困难。其他研究则详细分析了新近移居的藏族民众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既失去了传统生活资源，又因严重边缘化而难以参与其他能创造收入的活动。许多人无法和不断由外地流入的汉族移民竞争，而安置点的基础设施不足和房屋质量缺陷等问题则日益暴露。

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对于藏人与汉族国家的关系，还有一些更深远的影响。人权观察 2007 年的报告曾引述好几位中国学者提出的警告，他们认为，重新安置政策考虑不够周详，因此产生的磨擦“可能严重损害（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稳定”，进而演变为族群动乱。我们尚不清楚，强制迁移和住房改造政策所引起的不满，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 2008 年以来席卷西藏高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20 年来最大的一波群众抗议（详见人权观察 2010 年 7 月发表的报告“[我的亲眼所见](#) [I Saw It with My Own Eyes]”）。

2008 年的抗议并未导致中国政府重新检讨对藏族的政策，例如大量迁移和住房改造。从那时开始，中国政府实际上反而加速大量迁移和住房改造的工作，并且进一步收紧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限制。2011 年 8 月，中央政府宣布要将迁移和住房改造政策加速扩展到藏区以外，并在 2015 年之前完成将绝大部分游牧民定居化的任务，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以及内蒙古的蒙古人。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和他们面对藏人自焚潮的反应如出一辙：一再加强宣传攻势和镇压措施，拒绝检讨既定政策方针。

目前，尚无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可能接受藏族民众对于提升自治程度的明显愿望，即使只是在该国有关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规的有限范围内。相反地，由于中国政府将藏族独特文化视为族群民族主义情绪的潜在基础，它已采取从政治压迫到经济现代化的一系列措施，试图改造藏族社会，以便长期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cultural security）”。

因此，中国政府有系统地打击任何可能对官方政治、宗教、文化或经济政策抱持批判态度的藏族人士，指控他们涉嫌“分离主义”、破坏公共秩序或其他罪行。接受本报告访谈的人士大多表示，他们不敢批评大量迁移和住房改造的运动，因为政府已将其定为重大政治决定，不允许任何反对意见。

展望未来

中国政府为掩饰其政策的全盘影响，执意拒绝任何独立机构进入藏区调查事实。自2008年抗议风潮招致镇压后，通往西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各种管道，在执行人权调查的最佳时点遭到封闭，直到今天，学术界、记者、外交人员、甚至外国游客仍然非常难以进入。有关西藏和少数民族议题的言论遭到严密审查，使国内人士也难以进行客观的监测。

迁移与住房改造政策常被政府官员视为更大政治目标的一部分，例如打击藏人中间的族群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情绪。中央和地方政府当局总是以几十年来藏人物质生活的改善，证明中国统治西藏的正当性。他们也常表彰这些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融合”、培育藏人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忠诚、以及强化整体国家安全。实际上，官员经常将批评国家政策和威胁国家安全混为一谈。

这些因素可以解释，为何维护住房权利的抗争行动在中国其他地区不断增加，在藏区却十分罕见。在藏区进行任何抗议，几乎必然被视同叛国或受到“分离主义分子”阴谋煽动，立刻遭到镇压。由于不存在独立的司法机关，藏人告诉人权观察说，法律实际上几乎任由官员随意解释。藏人社群实际上根本无力依法反对或要求就迁移和住房改造命令进行协商。

摆明为改造藏族农牧社会而执行的各项政策，很容易造成藏区既有的政治紧张情势进一步恶化。2008年以后，大量军队无限期进驻西藏高原，加上引进新型社会监控机制——派遣数千名党员干部进驻农村，政府官员常驻西藏各地寺院，并且在城镇中部署新建的党组织负责监视居民——显见中国政府对于藏人普遍不满情绪的忧虑。

官方表述中，在藏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被视为在中国边境建立“长治永安”的一种途径，由此可见，北京认为此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性远超过眼前发生动乱的风险。但是，若执意凭借全面压制的环境，继续推进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恐将导致情势更趋紧绷，随时可能像2008年一样爆发起来，在藏人和中国政府之间造成无法弥平的裂痕。

中国政府若想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只需要暂停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政策，直到提出新的办法，符合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人权标准，尤其是尊重维持生计和住房的权利。

最重要的是，为了确保藏族家户真正自愿同意接受住房改造或迁移，中国政府必须建立值得信赖的咨询机制，保障受影响家户的合法权利，以及他们依据中国法律捍卫自身权利的合法途径。这样的咨询机制，必须如实地让受影响家户了解安居工程方案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与财务成本，包括家户必须负担部分住房改造成本，自余额最高可能达到七成。为确保咨询机制是有意义的，中国政府必须去除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的政治性质，使其与“反分裂”议题脱钩，保证一切对于相关方案的批评或反对意见不会构成或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煽动民族分裂”、“扰乱公共秩序”或其他经常被用来惩罚藏人批评国家政策的刑事罪名。

中国政府还应当暂停所有迁移游牧民的计划。大量的科学证据足以质疑政府强迫牧民离开草场的理由；针对被迁移社群的经验研究也显示，各种协助游牧民由季节性迁徙转为定居生活型态的措施均告失败。在草场退化确实是因过度放牧造成的地区，中国政府应该在征询当地社群的意见之后，研拟足以降低牲口数量或扩大放牧区域的解决方案，离牧定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自愿的。

要解消藏区的政治紧张情势，中国政府必须解决藏人不满意的长期因素。它应该落实藏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所享有的自治地位，并遵循国际法相关标准，使藏人在经济和文化事务上获得真正的决策权力。

主要建议

中国政府应当做到：

- 暂停执行迁移和住房改造，委托独立专家检视既有相关政策与实践是否符合国际法。检视的范围应涵盖所有要求或可能导致迁移安置藏族农牧民、没收其财产或强制屠宰其牲口的政府政策。
- 未经适当咨询或补偿者，政府应让受影响的个人或家户有机会返回原居地、或安置在原居地附近与其相似的地区，并依中国法律得到适当的补偿。
- 对于重新安置和住房改造后无法自谋生计者，政府当局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其可以选择适当的替代方案，包括恢复以放牧营生。
- 为遵守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相关建议及其他人权条约关于强迫搬迁问题的规定，政府当局应重新检讨 2007 年新通过的《物权法》，以确保该法符合中国依据国际法应负的国际义务。

- 承认并维护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确保藏人和其他人都能透过和平活动，针对包括迁移和住房改造政策的决策及执行在内的各种议题，公开表达关切或批评。

人权观察同时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成员国，和所有将在 2013 年 10 月出席人权理事会对中国普遍定期审查的各国，应呼吁中国政府暂停所有迁移和住房改造计划，直到这些计划能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其他建议详见本报告末尾。

建议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暂停执行迁移和住房改造，委托独立专家检视既有相关政策与实践是否符合国际法。检视的范围应涵盖所有要求或可能导致迁移安置藏族农牧民、没收其财产或强制屠宰其牲口的政府政策。
- 未经适当咨询或补偿者，政府应让受影响的个人或家户有机会返回原居地、或安置在原居地附近与其相似的地区，并依中国法律得到适当的补偿。
- 为确保重新安置过程的透明性与问责性，应将真正的社区咨询制度化，便利所有受政策影响者参与。
- 未来在重新安置之前，地方政府应该：
 - 对受影响的居民及其资产、社经条件进行普查，并根据普查得到的信息决定迁移区位，以确保其迁移后能维持同等或更好的生活水平。
 - 确认重新安置是否将会导致个人容易遭受人权侵害。
 - 给予所有受影响者适当且合理的事前通知。
 - 让社区充分了解有何法律救济管道可供他们对安置命令提出质疑，以便对重新安置怀有疑虑的人士可以申诉，并使其质疑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对于相关申诉案件应提供法律援助。
 - 建立简便的机制，使低收入公民易于取得有关重新安置方案的信息。
 - 对于重新安置后无法自谋生计者，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其可以选择适当的替代方案，包括恢复以放牧营生。
 - 当必须以其他土地替代，才能确保居民继续从事原有生计活动的适当机会时，应尽可能提供靠近其原居地的土地。
- 为遵守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相关建议及其他人权条约关于强迫搬迁问题的规定，重新检讨 2007 年新通过的《物权法》，以确保该法符合中国依据国际法应负的国际义务。
- 维护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承认藏人有权公开批评重新安置、法规命令和其他受到关切的议题。
- 建立透明的会计制度，管理中央政府拨给地方的国家补贴，以防公共经费遭到贪污或不良管理的风险。
- 依照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 2008 年 3 月抗议事件后的要求，开放进入藏区的管道。

对国际捐助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 确保一切形式的财政、外交或技术援助不被用来支持违背中国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迁移和住房改造计划。
- 呼吁中国政府暂停一切重新安置行为，直到能确保这些行为做到公正和透明，并且符合中国国内法和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
- 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当地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联合国监测机构和独立新闻媒体对重新安置计划进行调查或报导。

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

- 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应就中国的安居工程政策提出问题要求说明。
- 参与 2013 年 10 月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进行普遍定期审查的各国，应要求中国政府暂停所有的迁移和住房改造计划。
- 联合国关于原住民族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应致函中国政府，针对藏人的一般待遇和藏族游牧民的特别情况表达关切，并应要求中国政府邀请特别报告员到藏区执行调查任务。
- 人权理事会应支持适当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2006 年提交理事会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出于发展目的的搬迁和迁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准则》，敦促所有国家尽快通过这套关于安置问题的准则。

对在藏区投资的中国和国际基建公司

- 确保投资项目不会导致违反国际法的强迫搬迁，并且，若有必要进行重新安置，应确保其规划、执行和后续措施均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 以下方式改善公众信息管道：
 - 加强与当地和全国公民社会之间、以及与受安置影响的社群成员之间的沟通渠道；
 - 使公众更容易查阅相关文件，例如环境影响评估、定期环境监测报告、重新安置行动计划、以及执行进度报告等等，其方式包括提供以非技术语言撰写的简短摘要、将各种报告的摘要和全文翻译为当地语文、在互联网上公布、以及将纸本文件放在直接受影响社群的当地学校等公共建筑中供人取阅。
- 建立有效的申诉机制，使受到基建项目影响者，不仅可找政府，也可直接向业者投诉。

- 在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缔结任何伙伴或合约关系之前，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due diligence），确保项目用地的取得方式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和国际人权义务。
- 采取支持人权的明确政策，并建立相关程序确保在项目中的投资和参与行为不会直接或间接造成人权侵害。至少，要分析提案项目对人权的影响，并尽量降低其负面影响。进行这种“人权影响评估”时，应与当地公民社会团体协调合作。



在2006到2012年之间，中国藏族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藏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下，被迫改造房屋或迁移安置。在西藏自治区，2百万农民在政府指示下接受住房改造，即翻修旧房或改建新屋；在西藏高原东部，则有数十万游牧民被迫迁移，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定居村。另有1百多万人，预定在2014年底前陆续迁入“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政府坚称，所有的迁移或住房改造完全基于自愿，充分尊重“藏族农牧民的意愿”，但本报告却记载了各种人权侵犯，包括政府未于事前征询受影响居民的意见、或未于事后提供合理补偿，而这两点正是国际法上合法拆迁的必要前提。本报告还指出许多相关问题，例如政府提供的房屋质量有问题、居民无法质疑政府决策或寻求损害赔偿、被迁移安置者生计无着、以及中国法律明文规定的藏区自治权利未获保障。

根据数年来对居民进行深度访谈，以及官方媒体报导和卫星影像，《“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说明，藏人生活遭到这些政策激烈改变，却被剥夺发言权。本报告呼吁中国政府暂停所有迁移与住房改造计划，直到完成独立、专业的评估，确认既有政策及其实施方式是否符合国际法。

（上）一间传统藏式民居，摄于西藏自治区堆龙（Toelung）县。墙上用红漆写的「拆」字，表示这间房屋已预定将被拆除。

© 2007 私人提供

（封面）一面宣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看板，摄于四川省石渠（Sershul）县。

© 2011 茨仁唯色